

1967年1月20日,遭到林彪、江青一伙攻击的贺龙,被周恩来安排到北京西山象鼻子沟保护起来。就在这时,他的“罪行”又增加了一项——和彭真一起搞“二月兵变”。

“二月兵变”罪名为何加到贺龙头上



一张触目惊心的大字报

“二月兵变”的真相,要从1966年2月讲起。当时,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决定,从外地调来一个团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社会治安的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该团一时找不到营房,卫戍区听说北京一些高校师生到农村搞“四清”,学校里有空房,就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去联系借房。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听说后,没同意。最后,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政委刘绍文决定让驻在南苑的卫戍区某部挤出部分房子给新建团使用。

这本属于军队正常调动之事,在“文革”中“左”得过头的阶级斗争警惕性的支配下,却被一些青年当成改变的蛛丝马迹。6月的一天,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开串联会时,有人讲了2月间学校里曾要驻部队的事,并

提出,调动这么多军队很可能是要搞政变。北京大学团委干部丁键把大家议论的内容整理后写成大字报,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大字报把一些议论和猜测当成事实,激起强烈反应,很快被传抄到各校、各地。

康生抓住大字报做文章

“二月兵变”的谣言,越传越玄。傅崇碧、刘绍文指示找有关人员查清事实经过,报告给中央军委、北京军区和北京市委。6月29日,北京卫戍区写出了《关于解决独立团住房问题的经过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的写出时间与大字报的贴出时间仅相差12天,但康生已经抓住这一情况,大做文章。

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群众大会上说:“今年2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

第二天,康生的讲话即传到人民大学。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将已被任命为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郭影秋揪回学校批斗,要他交代“二月兵变”的事。

“政变”罪名加到贺龙头上

8月2日,邓小平来到人民大学,对所谓“二月兵变”的问题给予澄清:“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并强调:“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不算一回事。”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二月兵变”的罪名不久竟又加到贺龙头上。1967年1月9日,林彪在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公开攻击贺龙,说贺龙“到处夺权”,是个“刀客”,“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叫海军造反派“红联总”的几个头头立即行动,他指示说:“过去说彭真搞‘二月兵变’,实际是贺龙想搞‘二月兵变’,已经从组织上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我们要紧跟林副主席,揭露这一切。”没过多久,海军造反派“红联总”即贴出了有关这方面内容的大字报。许光达被污蔑为贺龙“二月兵变”的黑班底,内定的总参谋长。

当时,有人问李作鹏:“‘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李作鹏答:“去年‘二月兵变’,贺要把一军改调北京来,由于中央及时识破贺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北京有那么多部队,为何要调一军呢?”这份对话材料,后来成为李作鹏参与迫害贺龙的证据。

追查“二月兵变”株连极广

康生为在林彪身上作投资,继续信口雌黄,恶意诬陷贺龙。1967年1月29日,康生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说:“贺龙与彭真关系非同一般,他和彭真一起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1968年4月22日,康生在接见中央第二专案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时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和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又说:“还私设电台。”这类震撼全国的爆炸性谣言,不胫而走。

林彪、康生一伙自抓“二月兵变”后,不仅使贺龙的“罪行”升了级,追查“二月兵变”的大规模行动也迅速展开,株连极广。许多与贺龙共事的和在其领导下的人遭到监禁、毒打。许多优秀运动员如荣国团等被迫自杀。在康生的煽动下,不明真相的群众立即成立了“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游行示威,向中央施加压力。造反派要揪贺龙,冲到了象鼻子沟,因为周恩来设法阻拦,才没冲进去。然而,贺龙很快又被诬陷为“叛变投敌”,1967年9月13日,他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最终被迫害致死。

(据《建国后的贺龙》、《周恩来在1967》)

陈伯达捏造“伪党”案诬陷朱德

“文革”期间的多起冤假错案中,“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不仅离奇且骇人听闻。

传单案惊动“中央文革”

1967年10月8日深夜到9日凌晨,北京,在外交部外面的大街上,走来了一个神秘的人。他斜背一个发黄的挎包,沿着这条大街,将80多封油印的传单塞进一个又一个邮筒。第二天,邮局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些传单,这份传单的题目赫然是《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

“公开信”着重指出:当前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把持“中央文革小组”大权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兴风作浪,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公开信》甚至指责了毛泽东,赞颂了周恩来……

这份传单一在北京出现,立即惊动了“中央文革”,公安机关立刻进行立案侦查,并由陈伯达主管。谢富治调集了公安部的行家们集中力量突击侦破。11月20日,此案告破:投传单的人是天津一个卖煤球的工人,名叫沈剑云。

陈、谢下令要从党内挖后台

作者沈剑云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经公安部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的鉴定,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可是,陈伯达、谢富治硬说这个案件有后台,一再下令要从党内挖后台。

1968年3月,陈伯达、谢富治和吴法宪指使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利用已经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以及北京某学院的一个相同的案件,用诱供、逼供方法追所谓的“后台”。4月28日下午,陈伯达接见办案人员时说:“破案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头。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非常委员会是一个大案,不搞它的社会关系是搞不清的。”

追了几个月,进展不大。1968年8月19日、12月6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又两次接见专案组,给他们打气。陈伯达再次对办案人员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我的意见不算破案。”“这个传单集中了‘二月逆流’的语言,要很严肃、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谢富治则干脆挑明:“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总之是刘

邓黑司令部指使干的,要把后台揪出来,两个地方,天津搞,北京也搞。”

“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出笼

在陈伯达、谢富治的精心导演下,1968年12月,当时主管中央专案三办的赵登程等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采取了刑讯逼供,结果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这个党的“总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还称“中国(马列)共产党”早在1967年7月,曾秘密召开过“代表大会”。他们指使有关人员还编造了更加骇人听闻的案情: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

对这个被逼供出来的假案,连有的审讯人员都认为荒唐离奇。谢富治却说:“周(慈敖)的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并指示赵登程等人加紧逼供。1969年2月13日,周慈敖在逼供下,又诬供朱德、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同志签署了一封给蒋介石、蒋经国的电报,胡说电文内容是要求与蒋“联合起

来,‘挽救’中华民族命运,希望他们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

荒唐案无证据草草收场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时,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陈毅、李富春、王震等已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董必武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由陈伯达、谢富治等制造“伪党”假案的诬陷活动仍在继续进行。5月24日,为了获得所谓“物证”,谢富治批准对经委干部陈大伦的保姆和保姆的儿子、女婿等人办“学习班”,逼迫他们交代所谓陈大伦转移的“伪党”材料。陈的保姆于当年11月7日被逼自杀身亡。这时,由于“九大”以后的形势所迫,加上学习班逼人命也制造不出证据来,才不得不把制造“伪党”假案的活动停了下来。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就这一假案,对陈伯达进行审问。审判员问陈伯达:“按照你的讲话去追后台,你布置叫追后台,追出来那个假案,你有没有责任?”陈伯达低头认罪,答:“有责任。”

(据《文史精华》、《党史信息报》、《百年潮》)